

典藏张鸣

No.6

大历史的边角料

结合边角料，复活大历史

七十二篇精华之作，张鸣式回望、考证、品读与反思。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典藏张鸣 No.6

大历史的边角料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历史的边角料 / 张鸣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3 (典藏张鸣; 6)

ISBN 978-7-224-10477-6

I. ①大… II. ①张… III. ①中国历史—史评—近代—文集

IV. ①K2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02927 号

大历史的边角料

作 者 张鸣
出 版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发 行 北京时代联合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6 开 20 印张 251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2 版 2013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10477-6
定 价 39.00 元

写在前面的话

如果我算是学者的话,出道实在太晚,我的同龄人都已经扬名立万的时候,我还不大会知道学术是怎么回事。晚,一来是自己懵懂,看书倒是喜欢,但却迟迟不知自己稀罕的这点玩意,原来就是学术;二来是时运不济,自己喜欢的文史学不成,却稀里糊涂去学农机,虽然偶尔在演算习题和画机械图的空隙里看点闲书,顶多也是幻想说不定以后可以当回作家。后来总算明白点事儿,不再做梦当作家,改写学术论文,也经常不安份,写着写着,就变成随笔散文,把自己弄得活像是四不像。

这个集子包括《武夫当权——军阀集团的游戏规则》、《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再说戊戌变法》、《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大历史的边角料》六本。

第一本书,是我的硕士论文,当时我初涉学术,半懂不懂,觉得军阀史好玩,里面乱七八糟,头绪特多,就一头扎进去做,整整一年半,泡在北图,中午就啃个面包充饥。结果做下来,将要答辩的时候,我所属的教研室有某权威教授,说我越出范围了,即使答辩也通不过。当时,我在人民大学党史系,按他们的说法,党史系的人,就只能做中共党史的题目,做了别的,就是犯规。显然,我很不服气,当时我的同学,有很多人论文两个星期就做出来了,一样通过,我费这么大劲,点灯熬油地干,居然说不行,说我学术上不过关也就罢了,说个越界犯规,算个什么道理?后来,在若干好心人的帮助下,答辩的时候,总算阿弥陀佛,人家放了我一马。

我硕士毕业那年(1988),我的论文在萧延中的推荐下,得到当时主编“蓦然回首”丛书的陈晋先生的赏识,入选丛书。当时,一个刚出道的毛头小子,出本书,不拿出版费,也不用包销,还能得一点稿费,是件很令人兴奋的事。这本书,讲的是近代军阀怎样维系其集团的事,这些人,有回归传统的,有求神拜佛的,也有推行基督教的,更有学日本玩军国主义的,林林总总,眼花缭乱,当时将它们描绘出来,感觉很好玩,因为此前还没有人这样做过。在大家都奢谈文化的当时,算是一个异数。出版之后,学界没有多少反响,但有些做企业的朋友倒觉得有用,在他们看来,现在的企业

家,建构集团,弄企业文化,就是这一套,用人忠诚第一,效率第二,舅爷、姑爷满天飞,不是三纲五常,就是谈佛论道。

这本书出版之时,我已经回到黑龙江一个地处偏僻的农业大学里教书。当初人民大学的硕士还比较值钱,我不回去也能找到工作,但是,我当时打算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读书,回到老地方,有这么个学历,领导高看一眼,事少,地方静,自己感觉很合适。一心想着,等读一阵书之后,再出来不迟。

这样一闷,就闷了五年。这期间,除了给《读书》杂志寄过几篇随笔之外(都退稿了),几乎什么都没有写过,凡是写的字,除了讲稿之外,就是读书笔记。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整个学界,是不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的。等到我有心写第二本书的时候,已经是1993年的春天了。这年,我给上海三联一个丛书的编辑杨晓敏,发去了我的一本书的提纲,当时,其实也没有报什么期望,姑且一试而已。没想到,大概一个月之后,杨晓敏给我回信,说是可以签合同了。这本书,名叫《乡土心路八十年》,是我这么些年琢磨农民意识变迁的一点心得。书的出版,很是费了一点周折,期间,上海三联改组,班子大换血,杨晓敏也离开,很多签了合同的书稿,最后都退掉了。还好,我的稿子没有被退,但编辑换成了陈达凯先生,此公是上海学界的知名人士,最后在他手里问世的时候,已经是1997年了,此时,我已经博士毕业留在人民大学教书。

这本书,实际上是从底层民众的观念和意识变迁的角度,从新阐释了一下近代史。由于我们的近代史,有太多的意识形态说明文的特色,因此,改革开放之后,外面的信息进来,人们发现很多事不对了,很不满意。我出来这么一说,有些人感到挺新鲜。因此,这本书卖得很好,据说头一年就买了一万册,而一些老学者,比如孙达人先生,看到书之后还到处找作者,最后终于把我给找到了。

在《乡土心路八十年》交稿之后的几年里,我又对戊戌变法的历史产生了兴趣,这大概是我毛病,至今也改不了,琢磨一个题目之后,只要琢磨出点东西来,就兴味索然,只好再弄另外一个,我所谓的研究,是跟着自己的兴趣走,一般不讲究什么“需要”。对于戊戌变法这个史学界的老题目,我主要从三个大方面来扯开去:一是当时的帝后政治二元结构;二是满人

政治；三是戊戌变法的操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本身有什么意义。我不相信过去什么维新派、顽固派的传统说法，甚至帝党、后党的说法，在我看来，也是一团混乱，尤其不相信过去支持自强运动的西太后属于顽固派。在甲午战后，整个国家的上层，谁不知道不变法就要亡国？关键是帝后权力二元，如果变法成功，太后就要退休，面对退休威胁的西太后，自然对反对变法的声音，就比较听得进去。同时，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民族——满人，有自己的政治圈子，满人政治在整个清朝政治走向中，一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戊戌变法时，尤其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是满人政治和西太后的结合，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因为变法的措施，对满人的特权，有很大的损害。在这本书里，我也不相信传统的另一个更为流行的说法，说是康有为的《新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变法制造了舆论，推动人们解放思想，投身改革，在我看来，恰恰这“两考”和康有为以圣人自居，欲作教主马丁·路德的作派，使得很多本来倾向变法的士大夫反而走开了。事实上，几千年来，士大夫很难轻易接受另外一个人做圣人，哪怕这个人德高望重，功高盖世。他们称皇帝为圣上，只是情势上的客气，圣人只有一个，连孟子都只能是亚圣。尽管如此，戊戌变法在中国近代仍然很有分量，在启蒙上价值尤高，办报纸影响不止一代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也从那时开始，才学会了怎样开会，怎样发言，怎样表决。

很遗憾，我的这本书，影响最小，除了不多的几个学者表示关注之外，学界基本上不知道有这本书的存在。写完这本书之后，我又对义和团运动有了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拜我的博士导师程歆之赐，因为他是义和团研究有名的权威，作为我的博士论文，这就有了《拳民与教民》。这本书，现在已经跟《乡土心路八十年》合在一起了，其中有我的前妻许蕾的几万字的东西。

我的义和团研究，其实从美国学者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开始的，我赞同他不像中国学者那样，总是斤斤计较于义和团的组织出身，在民间教门上打转，而是将运动的起源，放在中国北方的乡土社会上。但是，作为中国人，我需要考察乡土社会风习、信仰、戏曲、民俗、巫术等文化因素，到底哪些因素对义和团起了作用，是如何起的作用？义和团是如何通过他们效法的戏剧人物，表现他们的政治意向的，民间信仰的符号是如

何转化为政治表达的。同时,教民,即中国的基督徒,是怎样一个群体,面对义和团的追杀,他们的宗教信仰体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特征。

《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一书,是我本世纪的第一本著作。在这本书的写作中,我尝试用散文体,把书的一个一个的篇章,变成一篇篇独立的文章,但彼此之间又有关联,串起来看,就是一个主题的讨论。我注意到,清末新政、北洋政权、国民党政府和后来的中共政权之间,有着意识形态的强烈对立,但是在现代化这个线索上,它们却存在着一条共同的脉络,这就是对乡村的整合与改造。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国其实是一个乡土社会,城市也有都市里的村庄,现代化的乡村改造路径,自然也对城市发生着深刻的影响,厘清这个脉络,对认识百年中国,尤其是大规模开展现代化建设的近代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这本书也给我带来比较大的学术声誉,现在很多学者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多是由于看了这本书。

余下的几本随笔,跟历史文化有关,跟学术也有点关系。严格地说,都是我的读书笔记。直到今天,我看书依旧“恶习”不改,随着自己的兴趣来,信马由缰。看到什么,但有所感,就立马把它写出来,由于学术论文的方式太正式、太刻板,就走随笔路线。我的随笔里,有很多小故事,但我不是为了讲故事才写的,其实多数的故事讲得都很简单,几笔就交代完了,之所以要写,主要是为了表达某种思想。久而久之,我的论文写得也像随笔,只是带注释的随笔,充分暴露我的“野狐禅”的本色。

之所以乐于把这些陈年旧货倒腾出来,主要是想向世人证明一下,我这个人,其实还有学者的一面,虽然这个所谓的学者,很有点野路子,而且归属不明,不知道该往哪个行当里搁,属于三界不收、五行不属之辈。此次出版,基本上保持原样,只做了少量的修订,想要大改,实际上也不可能。像我这样的学者,做学问,无非是傻子编筐——边做边像,现在像还是不像,读者自己评判。

一次喝酒,我对李零说,我最喜欢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他马上说,这是我的名言。一查,果然,他先说的,有字为证。不过,我说这话时,没看过他的名言,多少也该算我点创意。李零有随笔集曰《放虎归山》,意思是他特想跳出学术圈,回归读野书的旧日境界。跟他比起来,我只能算是一条豺狗,但豺狗也想回到山林,而且,我想,我能回去。

目 录

义和团的谜团

义和团的女人战阵 / 2

义和团：变幻的历史记忆 / 4

“义和团药方”为何再现江湖 / 10

世纪末的看客 / 13

又想起了王大点 / 16

拳民不是秘密的秘密——读史札记 / 21

义和团刀枪不入之谜 / 28

文学戏剧的意外影响

簧声戏影里的西太后 / 36

《三国演义》与隆科多的晦气 / 41

农民式的权力制约方案 / 43

关公、汉室与火羊阵 / 45

铡刀、棒子和妇女权利 / 47

六百年的孤独 / 52

三十六计海洛因 / 57

有关中国戏的一点涉外的往事 / 61

戏里的战争不让女人走开 / 65

教育回望

倒霉与王帽子 / 70

曾经有过的高教大跃进 / 71

教育改革视野下的乡村世界——由新政谈起 / 76

神经过敏的“经济特科”考试 / 81

私塾消失背后的黑洞 / 87
读老书与教老书 / 93
在私塾和读经之间 / 107
废科举：百年之痒与百年之羞 / 113
曾经有过的好事 / 120
大学考试对对子 / 122
学宫·学官·学运 / 124
西藏的“研究性大学” / 129
带“病”考试 / 132
五十七年前的学生档案 / 135
武秀才 / 137
只会考试的读书人 / 139
子见南子的现代性事件 / 141
云南讲武堂操场的沙砾 / 144

另类国粹

对毒与赌的另一种期待 / 149
旧医，还是中医？ / 151
科学不是强权——也说中医 / 160
梁启超和胡适的“医疗事件” / 163
男人的“不缠足运动” / 166
“历史另一面”的困惑 / 169
男人的头和女人的脚 / 176
三寸金莲与“金莲意识”的三寸 / 178
双枪兵与双枪将 / 182
豆腐跟革命的一点不寻常的关系 / 185

一点考据

有关人头像章的一点考据 / 188
辫子王朝的闲话 / 191

关于辫子与革命的零碎故事 / 197

有关名人和辫子的故事 / 204

董仲舒与春秋折狱 / 207

两千年后看董仲舒求雨 / 211

变戏法里的政治 / 215

“省官不如省事” / 217

宰相的座位 / 221

“九品中正”与唯成分论 / 224

门阀与清谈 / 229

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 / 234

小报告与大字报 / 236

翻译与政治 / 241

三跪九叩的健身操 / 244

粪业、粪捐与粪政 / 247

武夫与毛锥 / 249

宋朝的老爷兵 / 255

读后感

思古幽情与历史情境 / 260

难以解开的“中国结” / 262

肉食者的学问——跟李零读《孙子》 / 269

有关《花间一壶酒》的酒话 / 274

敲开一扇漆黑的大门 / 277

所谓外交

误会和不误会的教案 / 2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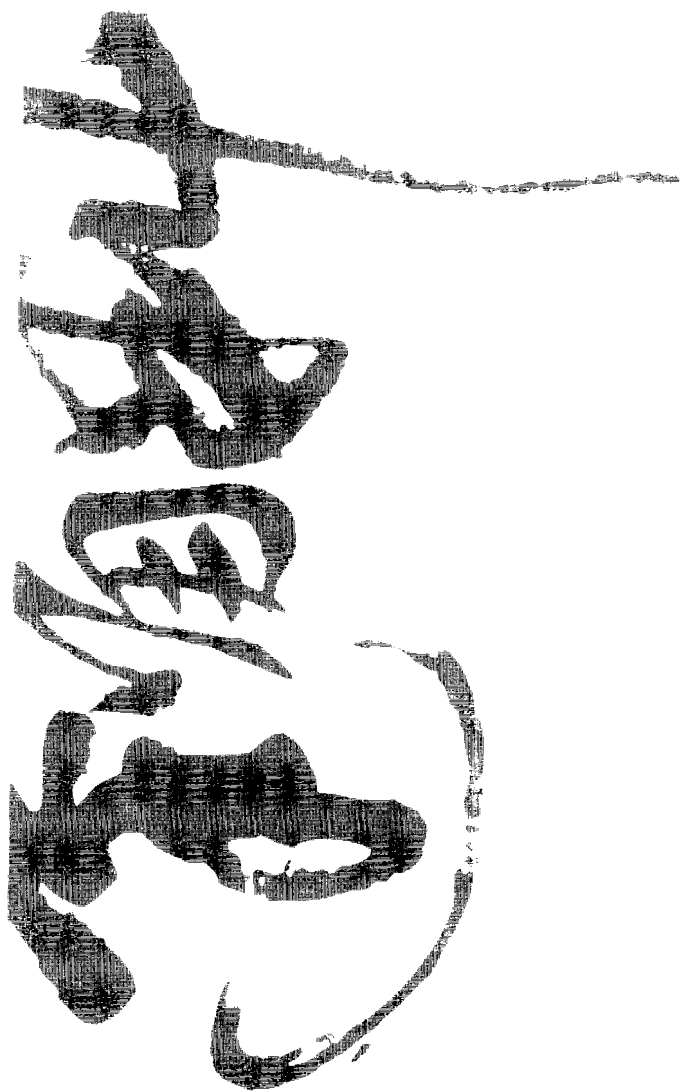
被燎掉的大胡子 / 288

洋人的八股取士 / 295

乾隆的威仪与英国人的半跪 / 299

林则徐的澳门之行 / 306

义和团的谜团



义和团的女人战阵

从来男人就离不开女人，连捉对厮杀的赳赳武夫也不例外。抡起膀子耍大刀义和团，无论是在传说的“神话”还是在现实的操作中，都跟女人有某些扯不清的干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义和团其实挺忌讳跟女人有什么瓜葛的。按说他们都是零件齐全而且年轻力壮血气方刚的男人，理应于男女之事有所想法，但是他们什么都没干过。在村里的时候，于庄稼妞秋毫无犯；进了城也依然保持“革命本色”，就连对他们为之深恶痛绝的洋人和教民，也没有过这方面的“战绩”。义和团是用法术包装起来的农民武装，按他们自己的说法，如果沾了女人，不唯法术失灵，而且还会遭到天谴因而大祸临头。因此虽然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们也能规规矩矩的。不过，糟就糟在虽然义和团一女不染，但他们的死对头洋人和洋教却邪门得厉害，专门喜欢用另一种法术来破义和团的功夫，这种邪门的法术又往往与不穿衣服的女人和女人的生殖器有关。于是义和团的队伍里就有了“红灯照”、“黑灯照”以及“沙锅照”。红灯照是由年轻的女孩子组成的，黑灯照据说是由结过婚的妇女组成的，而沙锅照最神，由寡妇们组成，据说威力最大，什么邪的都不怕。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似乎还没有发现红灯照们直接参加战斗的事情，在这方面，她们显然没有据说是以她们为榜样的女红卫兵们神勇。

也没听说过义和团让自己这边的女人在阵前脱下裤子，让敌人的大炮哑火（这是见于鲁迅的保姆阿长所述的太平天国事迹）。见于记载的跟战争有关的，只是说红灯照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可以扇着扇子飞起来，一直飞到外国去到敌人后方捣乱，比如在人家的首都放火什么的。在更多的情况下，似乎只要红灯照黑灯照们存在就可以了，与义和团有关的女人们只要坐在家里，不梳头不洗脸连裹脚布也不洗就

可以让洋鬼子的脑袋落地。义和团中最了不起的女人要算是“黄莲圣母”(类似的圣母还有一些),现在许多作家甚至学者都将她看成红灯照的首领,其实簇拥此“母”的,基本上都是大男人,她不是任何组织的头,只能算是义和团里活的神仙——男人女人共同的神仙。时人经常会看见一干轿夫用八抬大轿抬着她招摇过市,几队手持洋枪的拳民排开仪仗——威风得紧,在当时连头品顶戴的直隶总督荣禄见她都得诚惶诚恐地下跪。据说她有本事身体不动而元神出窍就将洋人的大炮上的螺丝拧下来,好让这些大炮全成废物,为此她经常会向人们展示一小包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螺丝钉。威风而且本领高强的黄莲圣母出身却有些暧昧,据现有的史料,此人原名林黑儿,一向在天津卫操着神女生涯,而且不属于地位高的那种,只能在船上混混。

当然,造反不在乎出身低,在这种农民起来闹事的时候,越是卑贱者也许越是有出人头地的可能。然而,义和团的拳民们将林黑儿捧上了天,并不是因为她的“苦大仇深”,而恰恰由于她的女性身份和低贱污秽的地位。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在它的原始时代大概都有过女性和女性生殖崇拜的现象,人们对于女性的生殖力量感到不解和迷惑,于是一种夹杂着恐惧的崇拜心理很容易生成,中国人当然也不例外,即使在进入长期的文明时期以后,依然存有这种心理的残留,一遇到危机就会以各种形式显露出来,想象洋人使用女性法术和自己拉起红灯照队伍,进而供起若干圣母,实际上是一种以神秘对神秘、“以毒攻毒”的战略,既然义和团认为洋人在每门大炮上配了一位裸体女人,那么他们自己拉出个做过皮肉生意的林黑儿来抵敌,自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在义和团运动中闪亮登场的女人们,虽然风光了一阵,但并没有真的就此提升了自己的地位。那些将农民战争与妇女解放相联系的人们,如果想到了这一层,脸会不会发热?

义和团：变幻的历史记忆

2000年，对于搞义和团研究的人来说是个非同寻常的年份。恰是一百年前，把北京和天津这样的大都市搅得天翻地覆的义和团，在几个月内演出达到了高潮，随即谢幕。义和团事件对于当时的中国最直接的后果有三个：一是让本来就被甲午赔款困扰、穷得快要当裤子的中国人又背上四亿两白银的大赔款；二是中国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第一次有了外务部；三是从山海关到天津一线外国军队有了“合法”的驻扎权，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大兵多到了可以打一场战役，而天津按条约规定，只许有外国军队而不许中国军队驻扎。小的时候曾经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七七”事变时，既然日本还没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也就是说还没打进山海关，二十九路军为什么会在北京南面的卢沟桥与日军打起来？前一段时间很畅销的一本书《我所见过的鬼子兵》的作者，在日本与众日本中学生辩论卢沟桥事变是谁先打第一枪时，难倒众日本中学生的法宝其实也是这个问题。从根子上追，都与义和团有点关系。当然，义和团事件的后果也不尽是惨事，庚子赔款支付了没几年，美国人退回庚款，于是有了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后来变成了清华大学。

在20世纪初，对于正在学习西方自觉追求“文明”的中国知识界来说，义和团的存在和发生无疑是个耻辱，一个让他们在外国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的耻辱，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多少人乐意谈“拳乱”，回避这个事件，无疑有讳言家丑的意思在内。自庚子以后直到辛亥革命，中国追求“文明”的自觉显然更加强烈了，一时间在市民们中间“文明”满天飞，看的是“文明戏”，戴的是“文明帽”，手里还拿着“文明棍”，连跟洋人叫板抵制洋货也自诩为“文明排外”，说到根上这都是叫义和团事件刺激的，大家无非是用自己模仿西方的言行举止的

行为跟义和团的“野蛮”划清界限。辛亥以后虽然渐渐地这种“追逐文明”的热潮开始降温,但是只要知识界与以英美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亲和感尚在,向西方学习的基调没有根本改变,人们就不会对义和团以及义和团的研究有太大的热情。应该说,在这一阶段义和团在知识界所代表的意旨就是与文明相对应的野蛮,而其内含的另一种象征中国本土文化对西方侵略的反抗的意蕴,基本上被遮蔽了。

实际上,知识界对义和团的否定,大体上还是一种手段层面上的否定,即由义和团手段的落后愚昧进而否定义和团本身,至多否定到义和团的某些行为,比如说滥杀无辜,从劳乃宣、袁昶开始就是如此,康梁诸人也差不多。也就是说,即使是中国进步的知识界,尽管在嘴上将义和团视为耻辱,但在内心深处并没有真的将之打入冷宫,对西方侵略的文化与实体性反抗的冲动,并没有因这场运动的彻底失败而消失。直到后来,甚至在引进学习西方文明最高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当“一战”结束、中国跟在协约国后面充当了一回“战胜国”的时候,先进的文化人在大骂义和团的时候,却跟北京的市民一样,十分热衷于拆掉克林德碑——恰由于义和团的“野蛮”——杀外国使节而导致耻辱纪念。

随着知识界的更新换代有了模样,一代新型知识分子成了点气候,由西式理念构架的民族主义自然而然地就滋长起来,这对于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都是一样的,反对西方宗主国的知识领袖,几乎无一例外地是由宗主国教育和装备起来的。其实不仅仅是“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缘故,一个古老的民族一旦产生了新的觉悟,就不大可能总是自甘末流,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先生”的强横与傲慢与实体性的侵略一样可以引起“学生”民族主义的愤怒。当然,这种愤怒的内涵其实并不一样,在被后来的史学家盛赞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大游行中,学生们一面高喊着“打倒列强”的口号,路过美国使馆时却起劲地向里面欢呼致敬,显然是因为美国总统威尔逊十四点原则的国会演说对弱小国家的亲和之意。而当新生的苏维埃俄

国对华表达了全然不同于传统帝国主义政策的友善信息时,也同样赢得了知识界相当多人的心(在那个时代,人们不大可能清晰地辨别这种信息到底是不是权宜之计)。这两件事像是某种宿命的象征,从那时以后,以对美英和对苏俄的态度为界,知识界划出了一条不甚清晰的右翼和左翼的线,虽然两者的民族主义诉求都是非常清晰的。

左翼知识界与右翼的不同,还在于拥有一套反对帝国主义的全新话语和行动模式,一旦某些“先进的中国人”接受并掌握了这套话语和模式,义和团的历史记忆就再一次被唤醒了,那个曾经将义和团贬得一文不值的陈独秀在后来的以宣传共产主义理论的《新青年》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竟然为他过去骂过的东西唱起了赞歌。接踵而至的反帝运动中,发动组织者对于行为是否“野蛮”的担心消失了,而这种担心在民初的“抵货运动”中几乎成了组织者的梦魇,但是义和团的梦魇却一次次出现在在华的西方人的梦中,以至于有些人显得相当神经过敏。自然,由于“先进的中国人”一直在埋头动员从前相信义和团刀枪不入的农民从事一场推翻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在现实的革命中被唤醒的义和团记忆并没有在学术界得到相应的回应。事实上一直到大陆解放,学术界对义和团的关注相当少,总共加起来,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本研究著作和少量论文。关于义和团迷信、滥杀和盲目排外的刻板印象,依旧存在于知识界的记忆中。

解放后,历史研究尤其是近代史研究理所当然地被并流到了营造新型意识形态的洪流当中,从前颠倒的历史被要求再颠倒过来,重新肯定义和团很快就被推到了议事日程上。显然,这首先是因为在近代两大农民起义中,太平天国的历史并没有被“颠倒”得太厉害,肯定太平天国,不仅亲共的学者做得到,亲国民党和非共非国的学者都做得到,而且也这样做了。义和团则大不一样,关于它“不光彩”的印象似乎在人们心目中留得太久了,人们一时半会儿还转不过弯来。但是,新政权重建新型意识形态的关键有两点:一是建立历史价值中的下层取向,即牢固地树立人民群众的正面的反抗性形象,并赋予价值观的

意义；一是清算历史上西方侵略的罪行，将日常的对于西方侵略的印象与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全新的反帝意识架构。无论从哪一点上讲，义和团都是最合适的翻案文本，“说事”的话题。特别是由于美国抗战以后的扶蒋反共，以及战后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美国成了中国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号敌人，而义和团运动中发生的八国联军入侵，基本上算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唯一一次和美国人的正式交手，所以更富有特别的意义（在朝鲜战争期间，这种意义就更加明显）。

所以，无论早年毛泽东对胡适有多少好感（早年的毛受胡适的影响很大，据说毛泽东之所以不出国留学就是受了胡适“不留学主义”的影响，而且胡适对于毛泽东办的《湘江评论》也曾大叫其好），也不论胡适实质上不过是个中共并非不能容忍的民主主义者，而且大陆解放后并没有去台湾投靠蒋介石，更不管争取这样一些观望分子的统战需要，毛泽东还是发动了对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全面批判。因为不彻底清除胡适的影响，对于完成意识形态的话语建构是有碍的。事实上，批判和清理知识分子中的崇美思想、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重新兴起的义和团再评价热潮几乎构成了一个系统工程，通过这个工程，历史学为新型意识形态的建构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这其中义和团的“研究”居功厥伟，作为一种几乎是从头开始的“历史研究”，而且是做翻案文章，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并“定调子”的前提下，它被注入了一种从前的学术界不好想象的革命语式，而且以革命的形式进行。今天的学者也许很难想象，那个时候的义和团研究文章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惊叹号，那么多好像是在面对面斗美国佬似的频频质问，为什么大家在揭露批判八国联军侵略行径时单单揪住美国人不放，相对来说反而将祸害中国人最厉害的德国和俄国人放在了一边？在整个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很难再有地方比义和团研究更直接和不加掩饰地使用着革命语式，充斥着革命的激情，研究者在许多方面甚至已经越出了毛泽东的定性，考证出义和团原本就有一